■知无不言

故乡的一草一木都有灵

◎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过年总是与家乡连在一起。一进入腊月,人们见面相互问候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过年回家吗?”这个“家”指的是故乡。不管你年龄有多大,也不管你的官职有多高、钱财有多厚、学问有多深,抑或你是多么没钱没势,回家乡过年,都一样是自然得不能再自然的事。因为家乡是根,是出发的起点,是再生的港湾,更是人魂的归宿。无论路途有多远,车船机票有多难买,也不管家乡是多么偏僻贫穷,人们都要千方百计地在年夜饭之前赶到家。尤其是近几年人口流动日渐加速后,过年回家就更是促成了陆路水上天空中穿梭繁忙的“春运高潮”。

今年的立春早于过年。立春那天正好是周日,我正奔走在故乡齐鲁大地上。那一天晴朗温和,过往的每一个地方,都让我想起读过的历史,就禁不住想说说故乡的文化。

当山东被主要分为齐国与鲁国时,我的家乡寿光属于齐国。春秋战国是中国文明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诸子游学,寻遍天下机会尽施才能的时期,也是百家兴起而争鸣的年代,随之积累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核心——儒学文化。这儒学文化自是源于并集成于齐鲁大地。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大成至圣孔子,到战国正酣时鲁国的“革命性”圣人孟子,再到为诸子百家画上句号的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都与这齐鲁大地有缘。当然,你也会反问说,荀子并非齐鲁之人。但别忘了,这位“刺取诸子,综合百家”并教出了思想家韩非子与政治家李斯的最具批判精神的长寿思想家,15岁就游学齐国,并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荟萃的学术中心——齐国的临淄担任过“稷下学宫”的主讲,并一度到秦国宣传儒学而碰壁后又回到了齐国。

就古时的齐国与鲁国而言,文化也并不完全相同。鲁国出思想家,曲阜的孔子,毗邻而居的孟子,都是鲁国地盘上最杰出的思想家。思想家出多了,这文化便带有严肃的味道,而且从仕的气氛较浓。那些鲁国饱读史书者思想深遂,怀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但遗憾的是,很少能在鲁国寻得实现这伟大抱负的机会,只得周游列国找寻明主。去得最多的地方恐怕是齐国,在齐国也确实大多受到礼遇,他们的思想也在齐国最早得以展显效能。我们读《孟子》,齐王问政的篇章居多,便是一个明证。

齐国思想家相比鲁国少,却重视有学问的思想者,能够招贤纳士,擅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当政者与百姓的实用主义较强,文化氛围也就较为轻松。春秋时的齐桓公,重用管子为相,广纳良策,终使齐国最早称霸于诸侯之中。战国时的齐宣王多次求教于孟子并施行其建议,也使齐国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盛者。

从齐国始起的山东半岛一向重视商业,经商传统源远流长。管仲就曾做过商人,在得到齐桓公的器重并任宰相后,十分重视发展商业与理财,使得国家经济实力日盛,他也成为历史上最早也最著名的财政思想家与实干家。

重视商业的同时,古代的齐国更是将农业的精耕细作视为不可动摇的基础,以至到北魏时的寿光(古称益都)人贾思勰(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写出了一部划时代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这部书被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盛赞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内中对谷物、蔬菜、果树和林木的栽培经验的描述细致之极。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烟台苹果莱阳梨”会闻名于世,更不难理解为什么寿光成为现今中国的重要蔬菜基地了。

实用主义的哲学,孕育了官民务求实效的精神,促成了农商的繁荣与稳定,随之带来的是比较轻松与略带休闲的文化氛围。最典型的体现便是,17世纪时的山东淄川蒲家庄人蒲松龄所写的极具浪漫主义精神的杰出著作《聊斋志异》。

说到有关经济的思想,鲁国的思想家们同样有着独到深刻而超前的历史眼光。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孟子努力使齐国的君主认识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可以说是风行现代的“制度经济学”核心精神——“产权制度”的思想源头。只是后来的统治者们,要么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权制度下“家国不分”,要么在“一大二公”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剥夺了个人的财产权,没有遵照与实施孟子的这一伟大思想,代价便是经济的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即便是就那些颇为正统严肃的思想而言,齐鲁思想家也各有特色。早于西方苏格拉底82年出生的孔子,以及孔子之后近两百年才出生的孟子,前者相对闲雅宁静,给人以“轻松愉快的感觉”;后者却主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给人以“凡事紧张的感觉”。孔子并未明确提出人性是善还是恶,而孟子却明确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孔子对政治社会秩序持调和改良态度,孟子则持可以“改弦更张”的“革命性”态度。再到后来服务过齐国的荀子,一些观念更是迥异于孟子,最明显的是明确反对“人性本善”,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只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与磨练,并加强社会制度建设予以制衡约束,才可能从善。荀子的这一思想,比近代西方法制核心理念奠定人休谟提出的“人人都是无赖”的思想要早2000余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上孕育并沉淀着一方的特定文化。从这一角度看,现代西方哲学史上的“地理学派”还是有其可观察到的现实根基的。尽管在当今全球化几乎要席卷地球上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生活方式的趋同性似乎在加速,但如果没有了文化的差异性,这世界也就少了活力与色彩。不是吗?匆忙赶回家乡过年的人们,各自的老家有着各自不同的风俗,这风俗对向往家乡的人们来说是那么地亲近与不可或缺。退一步讲,如果这过年的风俗都一样了,还有什么人文景观能吸引春节期间外出旅游的人们呢?

(写于2007年2月13日)

■看东说西

春节申遗:“下自己的蛋”吧

◎周 到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

倡议启动春节申遗万人签名活动最近在南京举行。继端午节被韩国申遗成功后,腊八节等一系列传统节日,又被韩国列入申遗项目。国人的春节申遗情节愈加浓郁。

平心而论,春节早已非中国独有的传统节日。朝鲜、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的法定节日中,都有春节。丙戌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2007年2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国人民祝贺丁亥年春节。二十九日(16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二会议厅举行第三届联合国春节文艺晚会。丁亥年春节前夕,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政要纷纷莅临华埠春节活动同贺新春。春节的国际化程度正日益提高。

而中国在传统节日申遗的问题上,已难免顾此失彼。按规定,一国每年只能申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果上述有关国家都像韩国那样步子迈得很快,即使国内有更多的大学教授像赶集似地发起申遗签名活动,文化部也无能为力。因为,中国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仅有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在腊八节的发祥地,腊八节并不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就更排不上号。元宵节等的情况与之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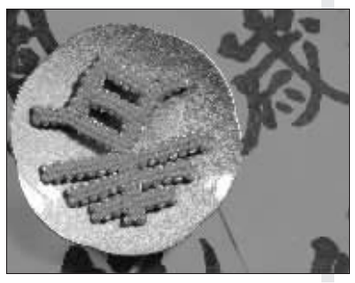
夏历节日能经久不衰,与其阴阳历优势有关。阳历只考虑地球与太阳的运动关系,阴阳历则兼顾太阳月亮地球三者的运动关系。阳历中的月份与月亮运动无关,徒有“月”的虚名。星期也是如此,与行星的运动周期毫无瓜葛。而阴阳历则产生于天文观察,二十四节气反映的就是地球与太阳的运动关系。清明节作为夏历节日,每年对应的西历日期,基本固定。这就是夏历中的阳历属性。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的作用,并不亚于西历的12个月份。

保护夏历传统节日的最好做法,是政府倡导与民间响应相结合,挖掘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是港澳台地区法定节日,冬至和除夕分别是澳门和台湾的法定节日。而春节则是内地惟一的法定夏历节日。内地是华人居住最集中的地区。这样的安排,使得内地的夏历节日影响式微。比如说,浴佛节为港澳地区法定假日,但内地居民能说出浴佛节在四月初八日的,已属少数。要进一步对浴佛节说出子丑寅卯的,更凤毛麟角。因此,对法定节日予以新的安排,不仅有利于“黄金周”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把夏历传统节日重新融入国人的生活中,也要比追求申遗成功来得更为实际。此外,要注意挖掘更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比如,以汉字书写春联,“俗多用秦叔宝、尉迟敬德”为门神(顾张思《土风录·门神》),等等。别的国家总不好意思说,这也不是中国的风俗吧?

申遗要有战略安排。我国的昆剧和古琴已申遗成功。但从中也看出我们确立申遗项目的顺序,缺乏远见。以昆剧为例。昆剧以京昆为正宗,念和唱用中州韵。但苏昆、高阳昆能与京昆鼎足而三。《十五贯》就属于苏昆剧。湘昆、川昆、草昆(流传于浙江金华、温州等地)影响要小一些。昆剧唱词典雅,案头性强。不看字幕,连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都未必能听懂。外国人接触昆剧,不仅要懂中国有关的地方话发音,而且至少还要有良好的元曲根底,以理解唱词。因此,昆剧的复杂程度远超京剧。笔者未见外国有演出昆曲的艺术团体。请老外把昆曲演得如行云流水一般,岂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能解决的?因此,这样精细繁复的艺术,即使在100年以后申遗,别人恐怕依旧欲争还休。申遗名额有限,我们应优先照顾最容易在国际竞争中丢失的项目,而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项目。

小品《策划》中有“下自己的蛋,让别的鸡说去吧”这样的台词。面对下蛋公鸡,母鸡怎么办?我看,首要任务不是与公鸡争论谁下蛋更具有合理性,而是又好又快地下自己的蛋,成立下蛋中心,告诉世人:这里的蛋不仅正宗,而且内涵丰富。

在处理境内资本市场和境外资本市场的关系时,我们要深谋远虑。《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境内证券交易所不会接纳境外企业为上市公司。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境外流通市值要大于境内。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重心仍在境外。这在国际上绝无仅有,并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境内证券交易所的国际竞争力。申遗尚未直接给本国带来经济利益,都存在国际竞争,与国民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本市场,就更值得重视了。如:如何增强A股市场对资本资产的定价权,如何让境内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等等。我看,我们并非公鸡,更应在自家窝里下蛋。为免若干年后在某些方面受制于人,在境内积极培育蓝筹股市场的同时,对企业的境外上市作战略调整,已显得十分迫切了。



■生活财思

贺年短信

◎林采宜
中国银联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金融论坛
专家委员会委员

从除夕上午开始,手机时不时地响起短信提示音,到了下午、晚上,短信提示的密度越来越高,从几分钟一个,到几秒钟一个,吃过年夜饭,更是连续不断,短信潮水一般涌入这个号码,小小机器里发出的提示音已经密集到让家人感到厌烦。

终于,先生说:“采宜,你把手机关了吧。”我关了手机,情绪也从阅读短信、删除短信上收回,回到他和孩子们身上。

有人说,过年收到短信的数量是人气指数。对此我不敢苟同,其实大多数短信是群发,按一个选择键,同时向某一组号码,甚至向手机里储存的所有号码发送内容一样的短信。那一刻,你或许是对方翻阅通讯录时机械输入的一串数字,或许是手机自动选择的一个符号,那些“新年问候”能够展示在你的手机屏幕上,是中国移动或者联通的通讯平台上两台移动终端信息交互的结果。

有人还说,不管短信的成本多么廉价,至少对方想到了你。这一点我仍然不敢苟同。大多数人的手机上存有几百个人甚至上千人的电话号码,哪怕只选择一组号码,至少也是几十个,我不相信群发的老兄有时间把他要发送短信的对象一个个都“想起”一遍,因此,收到短信、尤其是那些群发短信的时候根本不敢自作多情地觉得自己被人想起过,从来以为,之所以能收到这么多问候短信是因为我的手机号码在许多人的手机芯片内存上而不是我的名字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既然连“被想起”都是奢望,那么“人气指数”又从何谈起?

有一个经济学家跟我说过:“问候短信是平时素无往来的人保持联系最有效率的方式。”不错,一毛钱的通讯成本,加上零点一秒的时间成本(按一个发送或转发键只要一秒钟,如果你给十个人群发,那么人均时间成本是零点一妙,如果是二十个,那么更低,零点零五秒足矣),可以把人脉资源乘着节日的气氛“维护”一下,绝对是超低成本的人际关系经营方略。可是他忘了经济学最重要的一条,没有复制成本的投入产出模式带来的收益基本上趋于社会平均水平。通俗地说,群发短信不是什么人的专利,当人人都晓得用这种手段来笼络人际关系时,“成本几乎为零”意味着收益也几乎为零。否则就不会有人冒着冰天雪地的严寒去看望自己真正在意的人,也不会花费几十元甚至几百元的国际长途费用去跟至亲好友絮叨一会儿家常话。这种成本收益理论,日常的市井行话叫做“一分价钱一分货”;诗意一点呢,则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所以,要想把“效率”提高到一本万利或者无本万利,那是自欺欺人。春节期间每天有几十亿条短信在天上飞,一毛钱外加几秒钟维系不了什么关系,同样也提升不了什么交情。

当然,也有一些短信是出于言不由衷的应酬。前些日子流传一个段子:谁送礼了以及送了什么领导不记得,但谁没有送领导却记得。这样的逻辑推及短信,那是谁发了贺年短信以及写了什么领导不记得,谁没有给领导贺年领导却记得。怕未发贺年短信而得罪上司,这样的属下真是太低估领导了。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原理来看,一毛钱的马屁能拍出什么动静来?!倘若真想拍马屁,那还不如直接给领导送礼,别人都以短信问候而你以礼品问候,差异化“劣势”顷刻变成差异化“优势”。竞争年代,拍马屁也得拍得有特色,才能在领导的记忆中脱颖而出。

话说回来,短信也不是一无用处,如果在日常相处过程中和同学、同事、朋友在细节上偶有龃龉,那么岁末年初,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诚恳地向对方道一句歉意,或做一个解释,暖语一句泯恩怨,倒是好办法。祝福可以信口开河,致歉却要拳拳之心。这样的短信,无论对方是谁,都会心有所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虽然没有发什么短信,但我的确在除夕的爆竹和锣鼓中想念着一些人,那些在2006年曾经关怀过我,温暖过我,帮助过我的或者真正惦记着我,钟爱着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记得,有时是问,记得,有时是不问。”这是一个朋友的话,我格外喜欢。的确,问是关切,用语言去表达,不问有时候是另一种关切,冥冥之中,彼此用心去领受。今年,我是一个问候短信都没有发,好在初一的时候,发现平时特别默契的挚友亲朋大都没有发贺年短信过来。

“欲寄彩笺无尺素,天长水阔知何处”。因通讯不发达,来往不方便,思念一个人,却无法知道伊在何处,这是古人的无奈。

“随时随地,沟通无限”,却再也没有彩笺尺素、墨香纸绵,甚至没有可以留存的情感,这是现代人的悲哀。

此悲哀抑或彼无奈,何甚哉?

(2007年2月18日 凌晨 写于香港)

■边缘人语

从马拉火车说到创业板难产

◎胡飞雪
职业投资人 自由撰稿人 现居河南平顶山市

作为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铁路火车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的价值意义是很重大的,但是,修铁路通火车在近代中国曾引起的反对、争论、摩擦,却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1872年,俄国出兵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洋务派中坚人物李鸿章提出改“土路为铁路”的主张,因为俄国侵我边境,“我军万难远役”,如果不修铁路,难以有效制敌,但在当时遭到一片反对,史称“闻此议者,鲜不咋舌”,视为骇人听闻之谬论。1880年,中俄在伊犁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一触即发,运兵成为紧迫问题,李鸿章、刘铭传等再次提议修铁路。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如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有人奏称说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诬修铁路是“蠹民”的“邪说”。还有人上奏说修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会惊动山神、龙王,铁路火车实是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祸。

1880年底,由李鸿章主政的海军衙门出面开始修从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铁路,以利运煤,至次年修通后,他才正式奏报朝廷,并有意不伦不类地将其称为“马路”。即使如此,反对派还是罗列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最后相互妥协,允许铁路通车,但条件是必须用骡马拉引煤车皮。后来几经周折,方才允许蒸汽机车运行。1888年11月,李鸿章又提出修筑津通铁路,以期由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连结起来,加强军事、防务。这一奏请虽得到朝廷批准,但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也捅了马蜂窝,于是反对者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为了耸人听闻,反对者将修铁路与“灾异”强扭一起,称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

新事物引发的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利益力量的尖锐较量,以及朝廷、部门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弈,铁路火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史实是一面明亮可鉴的镜子。

不要以为只有前人才是愚蠢幼稚可笑的,虽然历史不能两次流过同一条河流,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应看到,许多历史事件是很近似的。中国规划发展中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上的创业板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进程中的命运就颇近似于晚清的铁路火车。

中国需不需要开设创业板,具备不具备开设创业板的条件?回答应是肯定的,理由至少有三:一是中国目前的企业已逾1000万家,其中的绝大多数(99.3%)是中小企业,而在多年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传统金融机构体系,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国有大中型企业。10多年来虽然初步建立了资本市场,但这个资本市场主要以方便国有大中型企业筹资为基本宗旨,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基本与资本市场无缘。中国的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意味着中国具有对创业板资本市场的极大需要。二是美国、香港的创业板市场的发展运作,已有很多经验教训可资中国吸取借鉴,中国若开设创业板,必会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少走许多弯路,发挥后发优势。三是学界、政界的主流声音倾向于开设创业板,2000年,当时的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也曾表示“创业板市场筹备已进入倒计时”。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2004年5月27日推出的是中小企业板块。对此,虽然主事者解释为几变几不变,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支持者还是深感失望,有人批之为不伦不类。而在笔者看来,就是马拉火车的翻版,变的是路轨机车,不变的是骡马。

力主推出创业板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是妥协的结果,如果不妥协,它就会被“一票否决”掉。那么究竟是谁反对开设创业板呢?成先生并没有明指。这实在是令人容易联想的怪事一桩,支持开设创业板的学者、官员,都敢于在公开场合或媒体上发表支持言论,而反对开设创业板的且包括拥有“一票否决”权的部委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或媒体上讲过不同意开设的话。当然,也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教授、博士连篇累牍地发表大作,声言反对开设创业板,但他们的理由和结论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不足为训。

如今,呼吁开设创业板的声音重又风生水起。不管马拉火车有几天,都显得太久,同理,把中小企业板块提升为创业板也不宜久拖。但愿中国证监会像力推股改一样,再一次表现出魄力来,排除阻力,尽快完成创业板的设立,把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度!